

#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138  
3

309  
2138  
3

#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第 三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第三辑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1/4 插页 1 字数 43,000  
1965 年 8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2,000

统一书号：4074·372 定价：(六) 0.18 元

## 編者的話

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

解放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个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剥削阶级不劳动，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劳动人民終日为剥削阶级做牛做马，却是一辈子受苦受难。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們經常受人欺侮，遭到人身的迫害，沒有呼吸的自由；他們掙扎在飢餓綫上，經常遭受失业的痛苦，沒有生存的权利。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是說不完、訴不尽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經過长期的武装斗争，終于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已經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新社会，劳动人民从过去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保障。随着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农民們說：“站在家门口，望

到天安门”；工人们说：“我是厂的，厂是我的”。正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就能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为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整个过渡时期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有必要经常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罪恶的旧社会——旧中国经济杂谈》（分辑出版），介绍旧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概念，就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认识旧社会的黑暗和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提高阶级觉悟。有人说得好：“不忆从前苦，哪知今日甜。”这套读物中所介绍的虽然都是过去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看看过去，比比现在，展望未来，就能激励我

們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

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和现有水平的限制，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和批評，幫助我們进一步提高这套讀物的质量。

1965年3月

統一書號：4074·372

定 價：0.18 元

## 目 录

傾 銷	朱展良 (1)
买 办	杜 若 (9)
包工头	叶孝理 (16)
学 徒	曹剑峰 (24)
厕所牌和厕所钟	靳 边 (32)
抽壮丁	夏順康 (37)
买青苗	罗来昌 (43)
标 会	一 农 (48)
祠 堂	董俊明 (54)
丫 头	董俊明 (62)

# 傾銷

朱展良

解放前，不論是大公司、小商号，还是街头摊販；不論是通商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都充斥着外国商品，有着外国傾銷商品的踪迹。人們还記得，那时一些公司、商店的门前往往漆着“經銷环球百貨”的大字，百貨店称为“洋貨店”，专门出售日常生活用品的雜貨鋪也都称为“五洋店”（一般是指洋油、洋皂、洋烟、洋火、洋烛）。抗战胜利后，在洋貨当中美国貨跃居首位，中国市场成了美国貨的天下。如一九四六年春天运到上海港口的美国商品，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調动了上海所有的起重机去卸，竟花了三个月時間才起卸完毕。“无貨不洋”、“无貨不‘美’”，这就是帝国主义商品傾銷下旧中国市场的写照。

傾銷商品，是帝国主义进行經濟侵略的一种恶毒手段。外国商品在旧中国市场泛滥的結果，使中国的民族工业遭到严

解放前美国傾銷  
商品充斥市场。



重的摧殘，給中國勞動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帝國主義布設在舊中國的商品傾銷網，就象千萬條吸血管一樣，他們通過這些吸血管吮吸着中國勞動人民大量的血汗。

帝國主義傾銷商品是有一套惡毒手法的。低價傾銷就是其中的一種。所謂低價，並不是說外國資本家真正不顧“血本”地壓低價格。外國商品價格之所以能夠比較低，是有各種原因的。外國資本家除了加強對他們國內勞動人民的壓榨，拚命加強工人的勞動強度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在生產中偷工減料，盡量壓低生產費用，以便在對外傾銷中處於有利地位外，他們還仗仗帝國主義在舊中國的特權，使外國商品在中國所納的稅，比中國商品所納的種種捐稅要輕得多。以英美烟草公司的卷煙傾銷為例，一九二八年它與國民黨反動政府簽訂了“統稅合約”。當時民族卷煙工業的卷煙除在產地納稅外，轉運內地，經過各地關卡，還須繳納各項雜稅。而英美烟草公司在華設廠所生產的卷煙，在產地繳納一次低額捐稅後，轉運內地時，只需領取免稅通行單，即可在全國通行無阻。以後，英美烟草公司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勾結愈加密切，它經常用預購稅票的辦法，大量貸款給國民黨反動政府，支持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英美烟草公司又經常以“債權人”的身份，對國民黨反動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國民黨反動政府以“簡化稅則”的名義，一再為英美烟草公司調整稅率。一九三〇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將原來的七級稅制改為三級稅制，使高檔卷煙的實際捐稅，從煙價的百分之二十六減為百分之二十二，低檔卷煙則由百分之二十一增為百分之二十三；一九三二年進一步改為二

級稅制，高檔卷煙的實際捐稅進一步減為不到煙價的百分之十，而低檔卷煙的捐稅則增加到煙價的百分之四十。英美煙草公司的卷煙主要是高檔煙和中檔煙，民族卷煙工業的卷煙大部分是低檔煙。因此，簡化稅則的結果，使民族工業的卷煙捐稅重、成本高，使英美煙草公司的卷煙捐稅輕、成本低，進一步使英美煙草公司達到排擠民族卷煙工業、搶占卷煙市場的目的。又如在一九四六年國民黨反動政府同美帝國主義簽訂的進一步出賣國家主權的“中美商約”和以後簽訂的一系列協定中，就保證美國商品在中國的徵稅等方面享有優惠的待遇。由於上面的這些原因，所以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價格一般都比中國產品低得多。帝國主義在低價傾銷中，當某種商品一旦在中國市場取得壟斷地位後，也就立即提高價格，攫取更大的利潤。

帝國主義為了打開商品銷路，還利用當時中國的商店、公司為他們經銷。帝國主義在一定時期內給這些經銷商以優厚的經銷利潤，如有些商店初期經銷美貨自來水筆時，一般進價只為市場售價的六折，如果長期經銷的話，在六折以外，還有九扣、九五扣等外加優惠條件。但這不過是暫時的利用罷了。例如當美國“派克”金筆開始來我國傾銷時，他們看中了那時一家書店在全國設有分支機構的有利條件，便給予經銷權和優厚的利潤。但等到銷路打開，腳跟站穩以後，馬上把這家書店經銷“派克”金筆的業務收回，交給當時的美商怡昌洋行經銷，滿賺滿盈。帝國主義傾銷商品，有時也直接經營，如英、美帝國主義合伙投資設立的英美煙草公司生產的卷煙，就是以

在中国的美国老晋隆洋行为据点，逐步在中国各地建立广泛的傾銷网的。

帝国主义还要弄噱头广告术和发奖等花招，誘人上鈎，傾銷商品。如在上海的美国老晋隆洋行为了推銷香烟，派人深入中国内地各城市 and 乡鎮，张贴广告，大肆宣传，并以赠送“試吸香烟”或随烟附給奖票，中奖者可获得金戒指、衣料等奖品作为誘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到中国来的美国大騙子、“原子笔大王”雷諾更是花样百出，他特地备了一架飞机，并把它命名为“炸弹号”，說是要作环球飞行，在飞經上海时就大肆宣传“原子笔”如何好，后来又來中国胡謔什么要帮助中国探測青海积石山，他就用这样的噱头广告术来替他的“原子笔”扩大影响，打开銷路。

帝国主义傾銷商品，疯狂掠夺中国人民，当然要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自“五四”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抵制外国貨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銷它的商品，竟采用改头換面的手法，以蒙蔽人們的耳目。如日本“藤田鉛笔厂”向我国銷售的一种鉛笔，就不再标明“日本制”字样，并取名“中华牌”，冒充国貨鉛笔，依然在我国市场上大模大样地銷售。“英美烟草公司”干脆把公司的名称改为中国式的“頤中烟草公司”，以达到繼續在中国市场上傾銷香烟，攫取高额利潤的目的。

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傾銷商品，正同它的其他掠夺活动一样，是常常同当时的中国反动政府和官僚买办勾結起来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通过国民党反动政府，取得了

在中国傾銷商品的独占专卖权，而国民党反动派就成为美貨傾銷的总买办，从中大发其卖国财。如宋子文的“孚中公司”独家經營美国十二家公司的商品，孔祥熙的“扬子建业公司”独家經營十六家美国公司的商品，这些公司实际上是美国公司的分銷处。此外，美帝国主义还以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供“援助”为名，借此大肆傾銷其“剩餘物資”；美帝国主义并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傾銷大量軍火，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人民。

上面談的还是帝国主义公开的商品傾銷，至于大量的商品走私，那更是五花八门。帝国主义通过千百条走私孔道，把大量商品向旧中国市场傾注。提起帝国主义的商品走私，要数美帝国主义最狡猾，最富有欺騙性。美帝国主义的商品走私主要有这样几种：

一种是假仁假义的“救济”走私。年岁大一些的人都記得，解放前，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个“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中国分署。这个机构打着“救济”的幌子，把整批整批的傾銷商品夹杂在所謂“救济物資”里运到中国来，因为这些物資都享受海关免驗的特殊待遇。仅据一些可查的資料，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前为止，由“联总”以免驗走私而来的物資，就达两三亿美元。这些物資有洋烛、肥皂、小汽车、无綫电等等。

再有一种是“彬彬有礼”的外交走私和滿天飞的“顧問”走私。解放前美国駐华的大使館和領事館，它們不仅是特务机构，而且也是走私机构。美国外交官員的自用物品和官用物品可以免稅，他們就大钻这个空子，把大量的私貨运来中国，大捞一票。連美国来华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各

方面的“顧問”也都享有免稅的待遇，他們也趁機大肆走私。

還有一種是掩耳盜鈴的武裝走私。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海關人員對於美軍的飛機和軍艦是“奉命”不准檢查的。因此在解放前象上海的江灣機場和外灘的美國海軍碼頭，也變成了美帝國主義武裝走私的基地。當時美國侵略軍、美國海軍西南太平洋司令柯克，就曾在中國大肆進行汽車走私；美國侵略軍的海軍陸戰隊也經常從事各種各樣的商品走私。

由於帝國主義公開的商品傾銷和大量的走私，使外國商品泛濫在舊中國的市場。據調查，解放前象上海的大公司如永安等公司，美國商品竟占商品總數的百分之八十；當時連大使用的手紙也有從美國進口的。在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下，中國的民族工業遭到嚴重的打擊，中國工廠紛紛被迫停閉。如西北的一些毛織廠有的還是在抗戰期間才建立起來的，到抗戰勝利後，因美貨瘋狂傾銷，就有八十多家關閉；一九四六年以後，上海有五百多家制襪廠相繼倒閉；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於美國水泥的大量傾銷，全國國產水泥的總銷售量僅六萬桶，只相當於抗戰前的八分之一，當時有不少水泥廠被迫停產；上海的梅林等八家罐頭食品廠，在美國罐頭的傾銷下，產量減低了百分之七十五，瀕臨停產關廠的邊緣；等等。

中國民族資本家在這種情況下，就千方百計地把帝國主義商品傾銷的惡果轉嫁到中國勞動人民身上，進一步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如有一家鋼筆廠借口銷路不好，竟一年不發工資，這樣，工人們在下工以後不得不到廠外找一些臨時活干，如拉人力車等，以勉強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有的廠解雇了

一批工人，对在厂工人則拚命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時間，每天工作時間有多至十四小时以上的。至于被解雇的和因工厂关闭而离厂的失业工人，其境况的恶劣当然也就更加不堪設想了。据統計，由于美貨的傾銷，一九四六年上海一地的失业工人就有八十万人，象成都这样的城市，当时失业工人也有十万人。

中国工人除了遭受上面所談的苦难外，还同其他劳动者一样，作为外国傾銷商品的购买者受到剝削。此外，帝国主义在傾銷商品的同时，还在中国以极低的价格搜刮农产原料，在不等价的交换中吮吸中国农民的大量血汗。所以，在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下，真正受苦、受掠夺的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前美貨泛滥的日子里，中国人民憤慨地称美貨是“美祸”。美帝国主义給中国人民带来的祸害，人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解放后，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已被鏟除，中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

解放后市场上的国产工业品犹如百花爭艳，引人入胜。图为上海市民在选购国产花布。



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发扬革命精神，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針，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取得了巨大胜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的迅速发展，工业部门提供的工业品日益丰富，依賴“洋貨”过日子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后中国人民掌握了海关管理权，在对外貿易方面完全独立自主，帝国主义的商品傾銷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已經成为历史陈迹。

# 买 办

杜 若

解放前有人称买办叫“康白度”，这是英文买办一詞的音譯。究竟买办是一种什么人呢？

早在十八世紀，清政府对外国通商实行了严密控制的行商制度。当时只规定广州一地可以通商，而且外国商人只能同政府指定的中国行商打交道。外国商人到广州，被规定住在行商的商館里。当时有人为外国商人承办駁运、伙食、掌管銀錢出納等，这种人就叫买办。这时的所謂买办，就是购买采办的意思。买办是由行商介紹和控制的，不同外国商人发生直接的雇佣关系，也不参与貿易活动，因为这时的对外貿易是由当时中国政府所指定的行商垄断的。

鴉片战争后，开始五口通商，对外貿易就不限于广州一地；由行商垄断对外貿易的制度也被外国侵略者摧毁了，外国侵略者凭借种种特权，可以在中国不受束縛地进行掠夺性的貿易。随着外国侵略势力触及所有各个重要部门，就产生了許多不同类型的买办，如洋行买办、銀行买办、工厂买办、公用事业买办、輪船公司买办、保险公司买办以及租界行政部门买办。此外，还有为反动政府向帝国主义借外債的买办，作为职

业政客的政治买办，贩卖帝国主义文化的文化买办等等。鸦片战争后新出现的买办同广东行商制度下的买办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他们是外国侵略者亲手豢养和直接雇佣的代理人，是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买办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过程中，取得高薪和巨额佣金，他们还自己经营买办性的商业，买卖房地产，从事种种投机活动。买办有外国侵略者作后盾，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的过程中分沾余瀝。

买办在哪些方面帮助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人民呢？现在就洋行买办的罪恶活动，分几个方面来加以揭露。

首先，帮助外国侵略者进行鸦片贸易。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以后，鸦片改用“洋药”名义，成为公开贸易的商品。鸦片进口，包括走私，每年都在五万担至八万担之间，价值在三千多万关两（即海关两，是旧中国海关征税时使用的记帐银两）以上，它的进口价值占进口商品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外国洋行要推销这样庞大数量的鸦片，是离不开买办的帮助的。因为买办与通商口岸的土行（即鸦片行）有密切关系。鸦片就由买办经过土行之手，然后逐步向内地扩散。象美国旗昌洋行、英国怡和洋行等都是销售鸦片的外国洋行。这些洋行的买办就是负责推销鸦片的经手人。鸦片在中国泛滥的结果，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的体质和精神。同时，为了抵偿鸦片的输入，中国除了输出农产品外，还必须支出大量的白银。这些都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鸦片贸易是外国侵略者掠夺和毒害中国人民最毒辣的一个手段，而买办则是外国侵略者的帮凶。

第二，帮助外国侵略者掠卖中国劳动人民。十九世紀初叶，英国、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已从中国掠夺劳动力到它們所統治的殖民地去做工。这种活动在鴉片战争之后急剧发展，在一八五〇至一八七五年間达到了高潮。据估計，仅在这二十五年中，被掠卖的中国劳动人民达一百二十八万人之多。当时在掠卖人口的主要口岸厦門，就有两家从事这种罪恶勾当的英国大洋行，即德記行和合記行。此外还有分設在广州和上海的美商同孚行，也进行掠卖人口的活动。他們通过买办，雇佣一批綁匪，到处进行拐騙。例如在一八七四年揭发出来的一个洋行买办杨俊洸，于咸丰年間，在广东澄海、潮阳两县交界的地方開設行店，名为貿易，实則私販人口出洋。一八六三年他潜入汕头開設张新兴行，仍是橫行不法，私販人口出洋。外国侵略者同买办勾結起来，把朴实的劳动人民騙入洋行的“猪仔館”后，便立刻用武力監禁起来，把他們剝得一絲不挂，并强迫在契約上打手印。契約上写明出国后工作年限及服从主人的一切命令等等苛刻条件。如果有人不肯立契約，就遭鞭打，还要坐屎牢。如果說不愿去和要逃走，便被綁起毒打，甚至击毙。洋行至少可从每名华工身上賺取四十元左右的利潤，而买办的佣金及綁匪的酬銀，一般是每名三元，后来涨到平均八至十元。这些掠卖人口的洋行发了大財，买办的口袋里也装滿了血腥錢。

第三，帮助外国侵略者推銷軍火。軍火买卖，对洋行来說，是一項数值最大、利潤最厚的买卖。买办从中取得的佣金也远远超过一般貨物。我国在解放前的将近一百年間，反动

政府镇压人民革命，以及军阀混战，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因此，买办为帝国主义向中国反动政府和军阀推销军火的数量，是十分庞大的。象美国慎昌洋行、英国怡和洋行、德国礼和洋行等都通过买办出售大量军火。帝国主义通过军火买卖，一方面在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买办本身也由此而发了大财；另一方面助长了中国反动政府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军阀混战的火焰，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第四，帮助外国侵略者销售过剩商品和搜刮廉价农产品。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使中国手工业破产，民族工业得不到发展。外国商品的推销，往往先通过买办设立或控制的买办商业机构；然后再利用代销形式，把各地小商铺也纳入他们的推销网中。例如我国进口颜料在抗战前一直被德国洋行所控制。一九二四年原来经销进口颜料的八家德国洋行合并为德孚洋行，它所经营的进口颜料占中国进口颜料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德孚”的进口颜料，大部分由德孚洋行买办和大颜料商人合股开设的谦和号经销。谦和总号设在上海，并在全国各省大中城市设立分号。从各省的分号中，选取一处分号作为省号，负责管理省内的销售业务。“谦和”同许多小城镇的一些小商铺建立代销关系，使这些小商铺成为代销处。“谦和”在全国的分号和代销处达两百余处之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推销网。德孚洋行通过这个推销网大力推销德国颜料（如靛青）的结果，使中国土靛青生产陷于破产的境地。

买办除了帮助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外，还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廉价收购农产品和矿产品，使中国的农业和矿业生产服

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并且造成一个收购网来垄断对这些产品的收购，以达到其掠夺的目的。例如英美烟草公司于一九〇二年开始在中国設厂后，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間，派遣买办先后在山东的濰县、安徽的凤阳以及河南的許昌等地，向农民推广种植美国烟叶种子，以适应它生产上的需要；接着它逐步在中国各主要烟叶产区，建立了收购网和烤烟厂，从而牢固地控制着烟叶的供应。在抗日战争以前，英美烟草公司的收购量占我国主要烟叶产区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有些地方竟达到百分之九十。英美烟草公司控制了烟叶的收购价格，对烟农进行着残酷的剝削。自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后，清政府被迫允許外国侵略者在中国通商口岸設厂，但并未包括内地。可是，这仅仅是一种官样文章的规定，事实上外国侵略者在内地完全可以通过中国买办出面經營。英美烟草公司在内地产烟区設立的收烟场和烤烟厂就是由买办出面的。收烟场运用种种手段，直接剝削我国烟农。例如它采用一种凭炕票入场售卖烟叶的毒辣办法。这个办法是，根据农民所有每一座炕烟房，发給一张炕票，凭票按期向收烟场出售烟叶。每张炕票按号輪流推排，須待五十天左右才可輪到售烟叶一次。由于当时烟叶的收购被該公司所垄断，因此烟农特別重視炕票輪到的日期，不論家中有婚丧大事，或者阴雨連綿，路途泥濘，总是推着独輪车不分昼夜地赶上票期。到达入场售烟叶时，英美烟草公司的买办和管事的人却故意挑剔，如說什么烟叶的水份大了，等等，尽量压低等級和收购价格。烟农被迫只得忍痛出售。

貧苦的烟农沒有資金种植美种烟叶，于是买办和地主就乘机而入，把实物(如用作肥料的豆餅和烤烟用的煤炭等)或現金以高利率貸給烟农。一九三〇年左右，在安徽凤阳的一个英美烟草公司买办每年向烟农放的高利貸款項就达七万元左右。农民一旦落入高利貸的魔掌，所受剝削也就更加深重了。

旧中国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被帝国主义所直接控制的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貸的剝削网所束縛着，終年劳碌，不得温飽。而为虎作倂的买办在为其外国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分沾余瀝，很快地发财致富，他們过着极其奢侈糜爛的生活。

前面揭露了洋行买办在經濟方面的罪恶活动，当然，买办的活动絕不仅仅限于这些。买办階級是旧中国反动統治的社会基础之一，在近代中国，买办制度同封建制度和反动政权的統治是分不开的。清政府的不少官僚本身也就是买办，象勾結帝国主义鎮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小刀会起义的上海道台吳健彰，就是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勾結美国强盜华尔組織洋枪队鎮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上海糧道杨坊，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到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以蔣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既是大軍火买办，又是借債买办、一般商业买办，集所有买办活动于一身，他們是旧中国最大的买办。他們以出卖中国主权为代价，取得帝国主义的援助，来屠杀人民，进行着长期的反革命內战。国民党反动派在同帝国主义进行的大宗的軍火交易中得到了大量回扣和其他种种利益。他們还在向帝国主义举借外債中得到巨額回佣，由外債所获得的外汇，又是

反动派发财的一个捷径。国民党反动派还充当一般商业买办。他们控制着重要的出口物资，把这些物资廉价卖给帝国主义；同时替帝国主义推销过剩商品。在这一出一进之中，他们又可大发横财。抗战胜利以后，旧中国市场上出现的美货泛滥成灾的情况，正是国民党反动派作为美帝国主义的总买办的结果。帝国主义通过国民党反动派这一在中国的总买办，吮吸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在为其主子服务的过程中取得巨大的利益，依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疯狂地压榨人民。

\*             \*             \*

解放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从此结束了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买办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今天，我们回溯过去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时，既痛恨帝国主义犯下的罪行，也对为虎作伥的买办表示万分的愤慨！

# 包工头

叶孝理

当我们看到电影《燎原》里老矿工易老倌、张老耿等的悲惨遭遇时，不能不使我们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包工头对矿工的重重盘剥和压迫感到十分愤慨。在旧社会，工人们除了受尽帝国主义、反动派和资本家的剥削外，还要遭到包工头的压榨。本文就来揭露旧社会包工头的种种罪恶。

包工制，是一种残酷的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并不直接雇佣工人，而是把工作任务发交给包工头，由包工头去雇佣工人完成任务。有的包工头还把承包下来的工作再分开来转交给其他小包工头，通过这些小包工头去雇工完成。旧中国的包工头通常都同地方封建势力和反动政权勾结在一起，称霸一方，垄断包工，工人要找工作做，非得找他们不可。

包工制流行在旧中国的各地区、各行业，在采矿、码头搬运、航运、建筑、纺织等行业中尤其普遍。在实行包工制的行业里有着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其名称各不相同，例如在采矿业中有“轆子”、“窑头”、“岔头”、“掌家锤”等，在码头搬运业中有“把头”、“档手”、“跑码头”、“拆眼头”等，在建筑业中有“作

头”、“档手(大包)”、“小包”等,在紡織业中有“包工老板”等。这些包工头依仗权势,对工人們进行残酷的剝削和压迫。

包工头剝削和压迫工人所采取的手法十分阴险毒辣,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克扣工資。在旧社会,帝国主义和資本家对工人的剝削本来就已经很重的了,再加大大小小的包工头还要将工人低微的工資层层克扣,这样就使工人所得更少,生活更加悲惨。

例如在旧中国的采矿业中,工人工資被包工头克扣的部分就很大。解放前开灤煤矿的約三万名采掘工人和搬运工人就由二百多个包工头雇佣和控制着,平均每个包工头雇佣和控制一百余名工人。这些包工头同矿局訂有严密的契約,使工人不能直接与矿局发生关系,从而便于中間剝削。当时矿局规定每产煤一吨給工資八角,根据工人的一般劳动能力,每人每天平均可采煤两吨,应得工資为一元六角。这个数目按照采掘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条件來說,本来就不算高,矿局資本家本来就已经扣除和无偿占去了工人实际所創造的价值的大部分。可是,包工头实际发給一个工人的日工資却只有四、五角。这样包工头每天竟又侵吞了工人应得工資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左右。

旧上海碼頭搬运业和航运业工人受包工头剝削的程度也极其严重。碼頭工人工資被封建把头克扣的部分达七、八成,有的甚至多至九成。

建筑业中的营造厂老板(作头)本身也就是包工头,他向建造单位的資本家承包工程后,再轉包給大包,以后大包又轉

給小包，这样层层轉包，层层克扣，最后建筑工人所得的工資往往只有营造厂老板最初承包工錢的六分之一左右。所以解放前在建筑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話：“营造厂喝血，大包头吃肉，小包头刮骨。”这句話生动描繪了解放前資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剝削，也揭露了大小包工头对建筑工人的层层剝削。

人們不禁要問：工人工資被包工头侵吞了这許多，那么这些工資是如何被克扣去的呢？包工头克扣工人工資的花样很多，有明的、有暗的，现在就以煤矿工人为例来揭露几种克扣工資的手法。

解放前的煤矿工人大多是被包工头从外地誘騙来的貧苦农民和失业工人，他們来矿时的食、宿、车船和到达后的安身等項費用，都是由包工头代垫的，这些就是所謂“鋪底費”。如当时辽源煤矿新来的工人在旅途上乘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悶罐车”，吃的是豆渣窝窝头，来到矿山后只領到一条破布和棉花粘到一起的“老虎被”，包工头所花的“鋪底費”实际上只有一、二十元。但工人上工后包工头就要每月在工人工資中扣款两元，这“鋪底費”要永无休止地扣下去。

还有强迫矿工搭伙，也是包工头克扣工資的办法。如当时辽源煤矿矿工在矿里吃的是发霉的高粱米飯和橡子面掺玉米面的窝窝头，每月伙食費最多也不会超过四元，但包工头竟强行在工人工資中扣除七、八元。

除了上面的扣款外，辽源煤矿的工人每月工資被包工头克扣的还有什么“共濟金”“石炭貸”“车牌罰”等等，名目繁多。前面談的連同这里列举的种种項目，表面看起来好象都是工

人自己的开支,其实說穿了都是包工头克扣工資的恶毒手法,工人每月的工資經過这样七折八扣,自己实得的簡直是微乎其微的了。

包工头不仅巧立名目,公开克扣工人工資,而且还明目张胆地克扣工資尾数,并通过吃空額(或称吃黑工)的办法克扣工資。所謂吃空額,即用假造工人名册或保存已死亡工人的名額办法,以少报多,虚报工人人数,这样包工头除了克扣原有的工資外,还可以吞沒虚报部分的全部工資;而工人們的工作量却大大增加,因为包工头是按虚报的人数承包工作的。这样每个工人的工資同过去相比虽未减少,但由于工作量更加繁重,所以实际上是包工头的一种变相的克扣工資办法。

包工头除了用克扣工資的办法掠夺工人外,还在矿区附近开设店鋪,向工人出售比市价高得多的商品,有的甚至高达四、五倍,借此进一步剥削工人。人們也許要問:这些店鋪出售的商品价格既高,工人为什么还要去买呢?包工头为了强迫和誘使工人购买,采取了种种办法。如有的采取在工人工資中强行搭发“实物引換券”的办法,工人每做完一工,就要領取一定数量的“实物引換券”(券上标明錢数),以代替貨幣工資。工人拿到这种“券”只能到包工头开设的店鋪去买东西,因为它在外面市场上是不能流通的。包工头为了誘使工人购买高价商品,有的采取賒欠售貨的办法,这种办法更加恶毒。工人由于所得低微,經常入不敷出,见到这种商店可以賒购,也就不得不忍受高价的宰割。这种賒售不仅售价高昂,而且到期还要付很高的利息,如到期未还,就要利上加利。工

人一旦陷入包工头布下的这一魔网，就无法脱逃。

包工头压榨工人的花样有的还有经济上的掩饰，有的干脆就强迫工人替他作“义务”劳动，工人这部分劳动的所得就完全由包工头领取。此外，包工头还常常借口家里有婚丧喜事，勒令工人送礼等。

工人同包工头之间是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包工头在招骗工人来矿山后，就强迫工人在雇佣契约上画押，规定工人受雇的期限，以及工人在受雇期间不得逃跑等等。所以工人除了受包工头的债务束缚外，还受雇佣契约的束缚。包工头为了对付工人的反抗，不许工人逃跑，经常使用残暴的手段。如他们通常都雇有兵痞流氓，组织监视队，监视工人的活动，有的还设有监狱和刑具。如果工人忍受不了折磨而反抗和逃跑时，一经发觉，就要遭到禁闭、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

让我们来看看解放前山西省许多小煤矿里工人们的悲惨处境吧。旧式小煤窑洞道狭窄，设备简陋不堪，窑内经常发生火灾、煤气中毒、窑洞倾塌等事故，工人常有伤亡。这些被包



解放前矿工们在手执鞭子的包工头监视下劳动的情形。

工头从外地招騙来的矿工們，在包工头的严密監視下，担負着极其繁重的劳动。矿工們在窑內背煤时，口衔旧式有柄油灯，手拿二、三尺长的木棍，偻僂負重，匍匐而行，常常弄得皮破血流，慘不忍睹。包工头规定，每个矿工每班必須背足十二、三次（窑洞深达三、四里），每次必須背足七十斤，除此以外，还要替包工头背“义务”煤。如果矿工因气力不足或病后体弱，背煤不足规定数量，就要受到包工头的鞭打。有的矿工因体弱而背不足规定数量，又害怕包工头的毒打，便逃入窑中黑岔內，即使数日不食也不敢外出，最后就活活餓死。

矿工們在窑洞內工作时受到如此虐待和严密監視，即使在工余时也不能幸免。矿工們住的是狭小而又黑暗的石屋。包工头为防止矿工偷逃，在屋子的四周布满了荆棘，夜間睡眠时将房门严加封鎖。包工头在窑场数十里內，还設有专人（叫作“巡风”）放哨、警卫。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即使能逃出窑场，也往往被他們捉回来。

上面介紹的只是煤矿业中包工头残酷剝削和压迫工人的例子。在其他行业中，如碼頭上的封建把头 and 紡織厂的包工老板，他們剝削和压迫碼頭工人和包身工也同样如此。

包工头用尽各种方法残酷剝削和迫害工人，他們吮吸工人的血汗，养肥了自己。例如萍乡煤矿和大冶鉄矿的包工头，每月的剝削收入約七、八百元，多的甚至达千元。包工头把从工人身上剝削来的血汗錢，用来购置大量的房产和田地，过着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正如萍乡煤矿工人所控訴的：“包工剝削深又重，花天酒地抽鴉片，三妻四妾置田地，都是工人血汗

錢。”

在旧中国，包工制度为什么能长期盛行呢？包工头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欺压和掠夺工人呢？这里有着許多原因：

第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办企业，进行經濟掠夺时，对当地情况不熟悉，直接雇佣中国工人遇到了許多困难。因此，需要豢养一批走狗和爪牙，通过他們去雇佣工人。于是就出现了包工制度，包工头也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第二，资本家明知包工头从中克扣，但是为了便于控制和加强剝削工人，他們也乐于采用和保存包工制度，利用包工头监视工人进行生产，拚命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以便攫取更大的利潤。例如，一項生产任务本来要一百工才能完成，但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取得更大利潤，就以七十工包給包工头，而包工头使用种种的压榨手法，則迫使工人以五十工去完成。这样，资本家和包工头双方均有利可图，而广大工人却受到了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剝削。此外，某些行业由于季节性的关系，需要的劳动力时多时少，资本家为了减少开支，不愿經常維持大量工人，但到需要时又能及时取得廉价劳动力，以达到最大限度剝削的目的，所以也需要包工制度，依賴包工头去招募工人。

第三，由于旧中国在反动統治下广大人民特别是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极度貧困，他們經常处在失业、饥饿、死亡的威胁下。而包工头勾結地方封建势力和反动政权，称霸一方，壟断着包工。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为了生活，不得不求助于包工头，忍受包工头的残酷剝削和奴役。

从上面許多原因来看,归根結柢,包工制度和包工头之所以能长期存在,这是由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在人吃人的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维护他們的反动統治,为了恣意掠夺和剝削劳动人民,他們相互支持,相互勾結,三位一体。包工头和包工制度,就是这些反动势力互相勾結的产物。

中国工人阶级为了取消包工制度,反对包工头的残酷迫害,曾經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反动統治以后,吃人的包工制度才被彻底废除,压在工人头上的包工头才被全部打倒。

# 学 徒

曹 剑 峰

“徒弟，徒弟，三年奴隶！”这是对过去学徒生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唯利是图、榨取工人血汗的资本家的无情揭露和对旧社会的严厉控诉。当然，在旧社会，广大职工都是资本家的奴隶，但学徒生活尤其悲惨，所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深重。

解放以前，穷苦人家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把自己的幼小子弟送进工厂、手工业作坊、商店去当学徒。但是，当学徒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得找介绍人、铺保，要付押金，要办拜师酒等等。在“金钱万能”的旧社会里，对于这一切都得求亲托友，花钱送礼。穷苦人家为此往往被迫典尽当光，负债累累。例如，上海有一个工人出身的工程师，解放前当他幼年时他的母亲为了把他送进一家机器厂去当学徒，曾向人借了“印子钱”去办拜师酒，负了债。这真是学徒未当，先受剥削。

学徒在进厂进店时，就得立下各种各样的字据。这些字据写明“只许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干”，“生死不管，不干还钱”等，以保障厂主和店主对学徒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甚至用“风云不测，各由天命”等封建迷信的宿命观念来欺骗学徒，使学

徒甘心忍受資本家的宰割。例如，河北邢台市有一个鞋厂工人，一九二二年十五岁那年，在他到一家鞋舖里去当学徒时，就曾訂了这样一份“学徒契約”：

“立字人××，因家貧人多，无法度日，情愿送子×××到邢台文盛德鞋舖当学徒。經×××說合，言明四年为滿。擦桌扫地，提水做飯。只許东家不用，不准本人不干。学徒期間，无有身价报酬。学滿之后，身价面議。如有违犯舖規，任打任罵。私自逃走，翻米拾石。投河奔井，与掌櫃无干。空口无凭，立字为証。”

又如，上海第四紡織机械厂馮小和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进信义机器厂当学徒时就托亲告友地找了一家竹器店做舖保，并立了这样的“保証书”：

“立保証书人李万兴竹器号，今保馮小和在信义机器厂充当艺徒。……习艺期限四年，期滿后在厂服务二年。恪遵厂章，不敢违犯，在服务期未滿以前，不得借故告退。……若有工作受伤、残废、丧命情事，系属天命，听凭工厂照章办理，别无要求。倘該学徒犯过开除或自行借故告退，經厂方追繳所耗津貼伙食时，由保人負完全責任。”

我們从这些“学徒契約”、“保証书”里，不难看出穷苦人家的子弟去工厂、商店当学徒，就象囚徒进牢獄一样。这种“契約”和“保証书”，簡直就是卖身契。

学徒进了工厂、商店，就得成天成夜地給資本家干活。他們的劳动時間很长，每天至少十三、四小时，也有在十七、八小时以上的。有些小厂、小店根本就沒有固定的作息時間，学徒



馮小和當年所簽的學徒“保證書”。

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两头见星星”。資本家为了迫使学徒加班做夜工，常常自己先睡上一觉，等半夜学徒由于劳累过度、容易打瞌睡时，再起来拿着鞭子紧紧盯在后面，学徒稍不留神，鞭子就劈头盖脑地打来。北京有一个老工人解放以前在一家飲食鋪当学徒时，长年累月缺睡眠，困得实在熬不住，有一天早上炸麻花时，就站在油鍋边打瞌睡。資本家看见了，便抢过油筷子，蘸上鍋里滚热的油往他的脖子上烙，烙得他滿脖子起

泡，到如今还留着疙瘩。看，资本家就是这样的毒辣！

旧社会的学徒在工厂、商店里从事繁重的杂务劳动，扫地、擦桌、倒痰盂、倒马桶、抱孩子、服侍老板和老板娘，成了资本家的家奴。

老板加在学徒身上的“规矩”是层出不穷的，如学徒不准看电影和戏剧、不准看报、不准留长发、不准学文化、三年或四年内不准回家、不准用真名、不准在衣裤上做口袋等等。如有违犯，就要遭到老板的毒打。在旧社会，商店里是“三年学徒，站不了柜台”；工厂里是“四年学徒，学不到手艺”。在学徒期间，如果学徒要求学技术，也得遭受资本家的打骂。例如天津市有一个工人在解放以前当学徒时，有一次对资本家说：“掌柜的，我来厂里两年了，想学点手艺活儿。”这时资本家就横眉竖眼，咆哮起来：“放屁！叫你干嘛就干嘛！”这个工人觉得自己没有理亏，于是又说了一句：“学徒，学徒，就得学。”“噤！”的一声，资本家扬手便是一记耳光，打得他的脸上马上起了几道红红的指印，接着拳打脚踢，最后，硬按着他跪在尖棱棱的一块三角铁上。一个学徒为了要求学一点手艺，在资本家面前说一说自己理所当然的心愿就遭此毒打和凌辱，这真是骇人听闻。

那末资本家为什么要如此阻止学徒学习业务技术呢？资本家不让学徒学业务技术是有他的打算的。因为学徒没有手艺，即使满了期，也离不开厂、离不开店，只好继续为他卖命，当他的家奴。

在旧社会里，不仅资本家阻止学徒学习业务技术，而且老

师傅也没有心思把技术传授给徒弟，一方面是因为老师傅自己也忙不过来，累得喘不过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旧社会，工人职业没有保障，“教会徒弟，饿煞师傅”，徒弟一旦学会了技术，师傅就要被老板辞退。因为学徒费用少，老板雇用学徒，可以剥削得更多。在这种情况下，学徒只能偷偷地学，有时师兄兄弟间相互学。学徒为了学得一些业务技术，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洒了多少血泪啊！

学徒即使偷偷地学到些业务技术，和工人、店员干同样的活，也是拿不到工资或津贴。他们是“学三年，帮一年，四年到头没有一个钱。”学徒除了伙食外，要是能得到极少的“月规钱”（即理发、洗澡钱）就算是很好的了。但是，这个“月规钱”简直是少得可怜。解放以前，在上海某些蔬菜地货行里，学徒的“月规钱”只有四角。有的蔬菜地货行没有厕所，学徒大便就得去公共厕所，而上一次公共厕所要付二分钱，一个月的“月规钱”只能上二十次公共厕所。

学徒一年到头做牛马，得到的仅仅是极恶劣的伙食。所谓供给伙食，实际上是管吃不管饱。每当开饭时，学徒先得饿着肚子，站在老板一家人饭桌的旁边侍候盛饭。老板吃剩的一点冷饭剩菜，才是学徒吃的。有的厂、店学徒即使是单独吃饭，伙食也非常恶劣，吃的是数量很少的发霉的粮和菜场上的落脚菜。有的小作坊甚至给学徒“咬菜帮，喝面汤”。

由此可见，学徒的劳动力价格是十分低廉的。根据对旧中国北京地毯业学徒制度的调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作坊学徒的劳动力价格，包括伙食，每天只不过一角

一分至一角六分。如果以每天劳动十四小时计算，他们的劳动力价格每小时为七厘九毫到一分一厘；如按十八小时计算，仅有六厘一毫到八厘九毫。

学徒在挨打、受累、吃不饱的折磨下，如果生了病，那就更悲惨。那时候学徒病了不但不给治，而且还要被迫继续干活。当学徒病得实在起不来时，资本家就以回家“休养休养”为名，把学徒一脚踢开。至于工伤事故就更不用说了。在旧社会，资本家只顾赚钞票，哪里还有什么劳动保护。不管多么危险的活，叫你干就得干。在这种情况下，学徒和工人一样，受伤的、残废的、死亡的，不知有多少！例如银川机械修配厂有一位老工人当学徒时，左右两只手四个手指在一个月內先后被机器压坏了，资本家根本就不给治疗，他只得自己求医，用竹片夹住指头接骨，两只手的手指都有竹片，连端饭碗也不行了。这时资本家还是不给休息，硬逼着他干活。又如上海国棉一厂一位老工人解放前当学徒时，有一次给资本家挑水，从二楼跌倒在马路上，吐了很多血，顿时不省人事。但是，资本家还说他是“骨头贱”，是顽皮掉下去的，却因此把他开除了。

学徒在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凌辱下，要想熬过来是多么不容易啊！据沧州市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位同志回忆，他在天津三条石同兴和机器制造厂当学徒时，亲眼看到二十多个学徒中，大部分被资本家折磨死掉，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六个人；天津裕大厂的八百多个学徒，不到三年就有五百多人被折磨死了。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欠下咱们工人阶级的血债！

在旧社会里，资本家虽然规定了学徒期限，商店一般三

年,工厂四年,但是,即使学徒熬过了这几年,资本家还是不会让学徒按期满师的。一个学徒的学徒期限越长,所提供的利润也就越多,因此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延长学徒期限。他们常常以“岁数小、身体弱”或“手脚笨、技术差”为借口,把学徒期限从三、四年延长到五、六年,这样学徒就得忍受资本家更多的剥削。

学徒在满师后,往往仍要被资本家用“自家人”“本柜徒”的幌子,被迫再“服务”一、二年(有的资本家还在“学徒契约”或“保证书”上明文规定),继续承受学徒期间的一些束缚和剥削。他们在“继续服务”的一、二年内,所得工资仅及一般工人、店员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那末,过了这一、二年,他们又怎样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旧社会,工人、店员以及其他劳动人民,还不是一辈子做牛做马,经常受着失业的威胁。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是说不尽的苦难。

总之,在罪恶的旧社会里,资本家对学徒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根本就不把学徒当人看待。资本家甚至无耻地说:“收来的徒弟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残酷的资本家就这样明目张胆地把学徒当作牛马看待。

解放以后,劳动人民做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学徒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得到了翻身。在新社会,广大青年走出校门,到工厂、商店当艺徒,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是干革命,这与旧社会穷苦人家子弟进工厂、商店混碗饭吃有着根本的不同。新社会的艺徒受到了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导。今天,党为青年艺徒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条件,安排了良好的生活

上海长宁区宏成南貨店  
艺徒在练包扎商品的基  
本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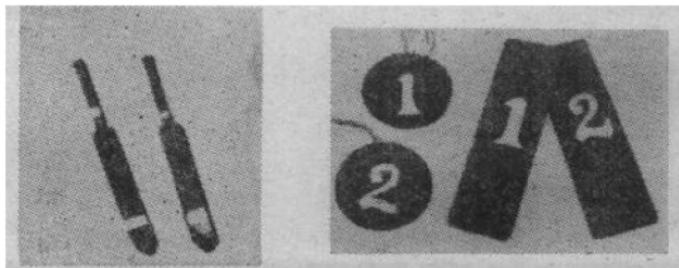
环境。为了提高艺徒們的阶级觉悟和工作能力，党让艺徒們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和提高自己；党还选派了业务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给予具体指导。老师傅們耐心、诚恳地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給艺徒。而艺徒在党的教导下，也逐步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艺徒們努力学习政治和业务，兢兢业业地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立志做坚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

## 廁所牌和廁所鐘

新 边

解放前，不少工厂里盛行着一种所謂“廁所牌”之类的东西。廁所牌的形状，有的是圓形和长方形的木牌子，有的是帶柄或不帶柄的竹簽子。有的地方也有把这种竹簽子叫做“恭簽”的。尽管它的形状各式各样，名称也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資本家为了限制工人上廁所的次数的一种恶毒的办法。

資本家规定这种办法，既然是为了限制工人上廁所的次数，所以在一个人数众多的車間里，廁所牌是很少的。例如，青島大英烟公司每二十五个工人只发两块廁所牌；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个有几百个工人的車間里，也只有几块牌子。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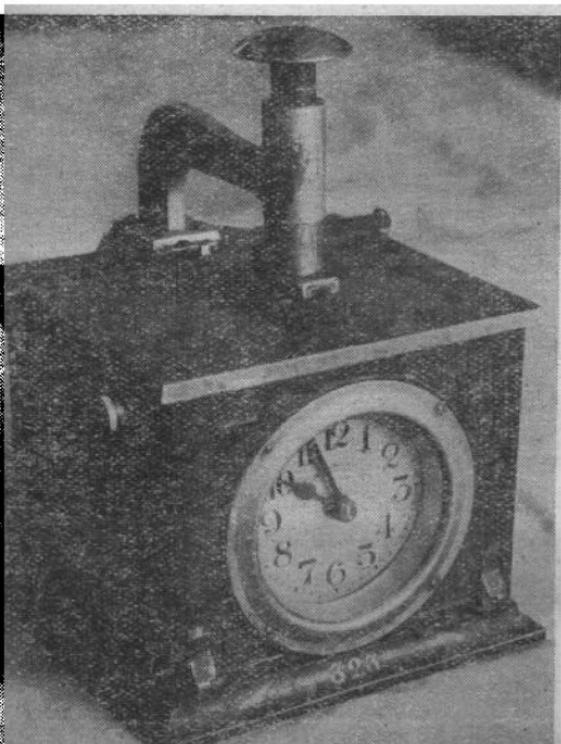
这是解放前青島大英烟公司和上海英美烟厂的資本家为了限制工人上廁所而設置的廁所牌。

廁所牌都是放在工頭那裏的。工人們要上廁所大小便，就必須通過工頭這一關。而工頭這一關却難過得很哪！誰要去領廁所牌，往往先要挨一頓申斥和臭罵然後才能拿到；如果當你要去領廁所牌時，正好車間里仅有的幾塊牌子都被別人拿走了，那即使挨了工頭的申斥和臭罵，還是去不了廁所。由於車間里工人多、廁所牌少，工人要大小便而挨不上是常有的事。不少工人，特別是女工，由於長時期不能及時大小便而生了毛病；有些工人由於憋不住而尿在褲子里，可以想象，一個工人穿了又臭又濕的褲子還要勞動十幾小時，那是多么難受呀！那時候，他們只能一邊勞動，一邊眼淚往肚子裏咽。

據天津東亞毛麻紡織廠的老工人回憶，這個廠的資本家，在很早以前，就利用過恭簽的辦法來剝奪工人們大小便的時間。在一個有一、二百人的車間里，只有二個恭簽。工人們要大小便時總是拼命的憋，除非憋得實在沒有辦法了，才不得不去一趟廁所。在挨夠了工頭的臭罵，領到了恭簽後，就得馬上飛快地奔向廁所。大小便完了，又得趕快跑回車間。即使這樣，工頭還是說你在廁所里“磨洋工”，因此而被記過，被扣工資，是經常發生的事。

廁所牌這種野蠻的辦法遭到了工人的堅決反抗，有些資本家就改變了手法，用“廁所鐘”的辦法來對工人上廁所進行所謂“科學管理”。上面提到的天津東亞毛麻紡織廠，在一九三四年以後就實行過這種廁所鐘的辦法。這個廠的資本家在工人廁所的門口設置了一隻由專人掌管的廁所鐘。這隻鐘是一種由打號機和時鐘聯在一起的自動機械，只要一按把

手，就会在紙上打出当时是几点几分。另外，在每个车间门口的墙上，挂着一个深蓝色的布袋子。布袋子的小格里放着“出恭卡片”，卡片上写着工人的姓名和工号。每个工人有一张出恭卡片，誰要去大小便，就必须拿着这张卡片，在进厕所之前交给掌管厕所钟的人打上时间，出厕所又得在厕所钟里打一次时间。工人去厕所的次数和所用的时间，都要记录在这张出恭卡片上。实行了这个办法之后，资本家就吹嘘说，他的办法既“科学”，又“文明”。这个办法，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比厕所牌或恭签之类的东西要来得“文明”些，工人多少可以“自由”进出厕所了。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更为恶毒的办法。因为用厕所钟打时间的办法，虽然可以免去了领厕所牌



这是天津东亚毛麻纺织厂的资本家在厕所门口设置的由专人掌管的厕所钟。

或恭簽时的种种刁难，但到每月月底，資本家就要检查每个工人的出恭卡片，累計上面共用去了多少時間。不管你在這個月中如何地少上廁所，資本家总是說你多用了時間，存心“磨洋工”、“吃白飯”，于是輕則罰工錢，重則开除。为了上廁所，这个厂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被資本家罰过工錢，有的甚至还被資本家开除。

天下烏鴉一般黑。不要以为只有在資本主义的工厂里才有这种野蛮办法，在資本主义的商店里同样也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职工上廁所的花样。以解放前上海大昌祥綢布店为例，老板为了残酷地剝削职工，訂出了一百二十条店规，其中对于职工上廁所也作了无理的规定。这个店里有一百多个人，可是楼下沒有廁所。老板为了监督职工上廁所的时间，把马桶放到三层楼，并在店规中规定大便不得超过五分钟，草紙只准用半张，腹瀉也不例外。在二楼扶梯口，老板設了一个检查职工大便的卡子(关口)，派专人坐在那里，記錄每人大便的时间及发放草紙的数字。如果违反制度，就得罰款。职工匆匆地拉了大便，要立即去簽到，如果忘了簽到或过了時間，就算违反制度。老板对“大便賬”是查得很勤的，要是发现大便的人次与所用的草紙不符，就要追根究底，查个水落石出。到了年底，他还把每个职工在这一年里的大便时间总加起来，与职工算总賬，扣职工的工資。

有人也許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資本家連工人的拉屎撒尿都要管得这么厉害？原来工人一分一秒的劳动時間，就是資本家手里黃灿灿的金子。工人劳动得越快、越紧张，給資本家

干的活越多,那么,資本家賺的錢也就越多。所以資本家除了逼迫工人尽量延长劳动時間以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强迫工人在劳动時間內一刻不停地、飞快地干活。至于工人的死活,他是不管的。資本家的剝削就是那么残酷,連工人的拉屎撒尿,他都得控制起来。所以,不管实行廁所牌或恭簽的制度也好,实行廁所鐘及出恭卡片也好,还是对职工上廁所实行登記也好,这些都是旧社会中資本家用以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残忍办法,这就是資本家的所謂“文明”,这就是他們为了发财致富所使用的卑鄙伎俩!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終于获得了解放。什么廁所牌、恭簽、廁所鐘及出恭卡片之类的东西,早已成为过去。现在,这些东西虽然还保存着,但是已經不是放在工厂的車間和廁所門口,而是放在階級教育的展覽会上,作为旧社会中資本家剝削和压迫工人的血腥罪証,并以此来向我們进行階級教育,使我們更加热爱新社会,痛恨罪恶的旧社会。

# 抽 壯 丁

夏 順 康

抽壯丁，是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和压榨劳动人民的一项血腥罪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是代表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抽丁、抓丁，补充反动军队的兵员，是为了镇压人民革命，屠杀人民，以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它还通过摊派壮丁费等，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

国民党反动派要劳动人民当兵，替它的反动统治卖命，人民当然不肯干。于是国民党反动派使出了一个骗人的伎俩，即所谓“抽壮丁”。那末壮丁如何抽呢？国民党反动派又异想天开地搞出了抽签的办法。这抽签，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公平，谁抽上，谁就去当兵。其实这是一个大骗局，抽来抽去，最后还是抽在贫苦的劳动人民的头上。

首先，在抽丁之前，反动政府就以“在校学生缓征或免征”的手法，将绝大部分剥削阶级的子弟排除在外。我们知道，旧社会学校里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剥削阶级的子弟，劳动人民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钱读书。所以反动政府的这项规定，实际上也就基本上把参加抽签的对象限制在劳动人民子弟的这

个范围之内。

其次，当时具体执行抽壮丁的是国民党的乡长、保长等，所以即使有少数剥削阶级的子弟不是在校学生，而这批反动派的爪牙在主子的指使下，还可以运用种种方法，把剥削阶级的子弟排除在外。例如，在壮丁名册上的这些子弟的姓名下注上“因病缓征”字样，使他们在国民党区、乡政府中随便安插一个挂名的职务，或在当地小学、中学里做个挂名“学生”，等等。

再次，前面谈的是反动派在抽签以前的种种花样，即使临到抽签时，如还有若干名额系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需要庇护，乡、保长等还可以在抽签上大做文章。他们在抽签时常常耍弄这些花招：一、暗暗地把应征壮丁的数目大大增加，这样主持抽签的人就有“机动”的余地，有些剥削阶级的子弟即使抽上了应征签，也可以不去。二、把签完全写成“应去”，先叫劳动人民的子弟去抽；或把签完全写成“不去”，先叫剥削阶级的子弟去抽。这样一来，所谓抽签，实际上也就是反动派预先安排的戏法了。

广大劳动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抽壮丁的骗局是洞悉其奸的。不管抽签也好，不抽签也好，替反动派当兵的枷锁最后总是套在劳动人民身上。要迫使劳动人民替反动派去卖命，谁会去干。因此广大劳动人民纷纷逃避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把什么壮丁名册和抽签方法等统统收起来了，干脆用更加赤裸裸的拉夫的方法，这就是抓壮丁。抓壮丁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有白天拦路捕捉，有夜晚破门绑架……，被抓的人当然也都是劳动人民。

无论是被抽中的还是被直接抓去的，一旦落入反动派的魔掌，很难脱逃。壮丁们被反动军警五花大绑，一个个被用绳子串起来，押往营地。反动派为防止壮丁逃跑，在夜间宿营时甚至要把壮丁们的衣裤脱光才准入睡。壮丁们对反动派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如稍有不滿和反抗，就要遭到毒打。所以被捉去的壮丁大多就这样被折磨而死。在途中或入营后能逃走生还的真是寥寥无几。

被捉去的壮丁遭到这样的苦难，留在家里的人也还是死路一条。因为被抽走或抓走的大都是一家的主要劳动力。家中一旦少了主要劳动力，剩下的老弱妇孺，也就更加难以为生。

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的压榨下，本来生活就已动荡不安、朝不保夕，再加上抽丁抓丁的迫害，更加使人们日夜不安，苦上加苦。苦难的人们为躲避抽丁抓丁，很多都不敢睡在家里。有的在草堆或坟堆里过夜，有的长期在河里搭船游荡，过着流浪生活。例如，安徽省安庆市有一个搬运老工人在回忆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抽抓壮丁带来的苦难时，曾愤慨地揭露过这样的事实。一九四七年腊月二十四日正当人们准备过新年时，他的儿子却黑夜摸着跑到三十里路外的乡下亲戚家去躲避国民党反动派抽抓壮丁。后来，乡下也躲不住了，只得撑着一条船，白天黑夜都在怀宁和桐城交界的一条河里，藏在芦苇深处。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怕被反动派发觉，白天不敢烧饭，成天饿着肚子，真是活受罪。为了躲避抽抓壮丁，也有的不得不抛弃生产，去深山野林，长期挨饿受

冻,受尽折磨;有的外出四处流浪,被迫沦为乞丐;有的甚至索性斩断自己的手指、截去自己的肢臂,成了残废。

国民党反动派抽抓壮丁,对劳动人民来说,不仅是一种血腥的迫害,而且也是一种残酷的掠夺。国民党反动官僚及其爪牙,趁抽抓壮丁的机会,对劳动人民大肆敲诈勒索。他们敲诈勒索所采取的手段是十分卑鄙毒辣的,各地常见的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巧立名目,多次索取壮丁费。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担负的苛捐杂税已经够沉重的了,可是贪得无厌的反动统治阶级还要再勒交壮丁费。索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按丁捐,按亩捐,按人或按户捐等等;索取的名目五花八门,有安家费,征集费,抚恤费等等。据江苏无锡梅村区的调查,从一九四八年秋季到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反动统治者就摊派过三次壮丁费,每次每名适龄壮丁勒索米八斗至一石,非适龄壮丁一斗至三斗。又据解放前江苏句容县老塘乡第五保的统计,一年间,苛捐杂税总数折合稻谷为一万四千九百一十斤,其中壮丁费一项就达一万一千八百斤,占苛捐杂税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劳动人民被这种壮丁费逼迫得告贷无门,甚至卖儿鬻女,家破人亡。

第二,弄虚作假,从中勒索。前面已谈过,反动统治者往往利用抽签来强迫劳动人民应征当兵。他们同样将抽签的把戏,用来作为他们的生财之道。在抽签时,他们把应征中签人数暗中大大增加,使大部分适龄壮丁抽中应征的签。然后,又让劳动人民出钱“贖丁”。广大劳动人民不愿为反动派当兵卖

命，不愿使家庭主要劳动力被抽走后造成全家生活无着，也就只得被迫变卖田产或求借于高利貸者，給乡、保长送上一大笔錢。沒有錢行賄的，就被抽去当兵，有的还被那些貪得无厭的乡、保长轉手販賣，从中取利。按照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頒发的“兵役法”规定，独子是应该緩征或免征的，但反动統治者及其爪牙为了敲詐更多的錢，經常运用各种花招去抽那些独子壮丁。例如解放前上海郊区紀王鎮鎮长經常利用抽壮丁来压榨农民。他了解到有一个姓张的农民家有一独子，就借抽壮丁为名派了“自卫队”連夜把这个农民捆到鎮上，結果敲去了十一石米，才把人放了出来。

第三，綁架搶劫，进行压榨。抽丁是反动統治者的生財之道，抓丁更是他們斂錢的机会。反动統治者常常使喚自己的武装爪牙，把大批的适龄壮丁或壮丁的亲属抓来，关入牢獄，使他們挨餓受冻，然后要受害人的家庭出錢来贖。如江西萍乡市湘东公社新村大队有一个农民，解放前受尽了抓壮丁之苦。那时，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先被当保长的地主抓去。他被逼出卖了家中可卖的一切东西并借了高利貸，勉强湊滿了六十块銀洋，向保长贖回了大儿子。后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又被陸續抓走，因家里实在无錢再贖，只得被迫到反动派軍隊去当兵，不久，两人都死了。在旧社会，象这个农民家的不幸，正是成千上万家劳动人民的遭遇。

在旧社会，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剝削和压迫是說不尽的，抽抓壮丁仅是劳动人民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压榨的一个方面。即使这样，但我們也足以看出旧社会劳动人民的处境是何等的

痛苦和不幸。

今天,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再也不受那些反动统治者欺侮和压榨了。但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决不能让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任何复辟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实行全民皆兵,保卫住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

# 买青苗

罗米昌

“买青苗”是旧社会地主、富农和商人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高利贷剥削的一种形式。

买青苗这种高利贷剥削，在解放前遍于全国农村。买青苗的内容包括粮、棉、桑、茶、烟、果、蔗等种种农产品。当每年青黄不接时，穷苦农民逼于生活上的困难，将没有成熟的农产品，用贱价卖出去，而地主、富农和商人趁机杀价预购，使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削。

例如，解放前，江苏省松江县高桥乡有一户贫农，家有大小五口，种水田五亩。有一年春未夏初，稻子刚插好秧，他家生活上发生了很大困难，因为上一年这个贫农生了一场重病，治病用了一些钱；田里农活少人做，下肥少，收成又不好，所以到这年青黄不接时，家里吃粮断了，眼看一家大小就要断炊挨饿，手里连买盐的钱也拿不出，更不用想买粮食了。人要吃饭、田要施肥，田里不追施肥料收成要差得多，人穷养不起猪，没有猪粪肥，追肥靠买点豆饼、化肥，当时人都吃不上，买肥料就更顾不上了。为了渡过春荒，为了几亩薄田不至于有种无收，在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只好请了“中保”到地主家去出

卖他的三亩青苗。地主压榨农民是无孔不入的，见有人要卖青苗，正对胃口，当下就由地主“估产开价”，一亩估产两担，每担开价比市价低一半，价高不买。贫农明知地主杀价狠、估产低，但是迫于家里等米下锅，只得答应，按照地主的条件出卖了三亩青苗。到今年秋收一算账，三亩田收谷九担四斗，地主只付了三担谷价，拿走了九担四斗稻谷。半年时间还不到，这户贫农就受地主二倍多利息的剥削。

解放前江苏奉贤县农民种棉花的很多，那里贫苦的棉农，常有卖棉花青苗的事发生。当地有许多地主、商人开设的“花米行”，每到青黄不接，趁农民急于用钱的时候，“花米行”就派人下乡，杀价订购农民种的棉花。当地叫做“卖抛盘花”。当时许多棉农都受到这种高利贷剥削。奉贤四团地区有一个姓王的农民，一九四七年，反动派要抽他当壮丁，不然，就要交给保长二担米钱的壮丁费才能免抽。那时，这个农民的生活本已很困难，田里种的棉花还是青苗，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请了保人去“卖抛盘花”。当时，米价高，花价低，商人杀价，二担棉花只合一担米，二担米就要卖四担棉花。他被迫预卖了四担花，交给保长二担米钱才算了事。到今年秋收时，一担棉花价格与一担米价相等，这个农民等于交了四担米的壮丁费，他一年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几乎被剥削一空。

浙江武义地区出产桐籽，农民种桐树的很多。解放前，地主、富农和商人趁春荒时用稻谷贷给种桐籽的穷苦农民，预买农民的桐籽，用高达几倍的利息盘剥农民。武义县俞源地区有一个姓俞的贫农，解放前种了一些桐籽，青黄不接时无钱余

米，地主便借給他一百斤稻谷，要他秋天归还一百五十斤桐籽。秋收时，一百五十斤桐籽相当于四百斤稻谷。换言之，这个貧农借地主的債付出了高达三倍的利息。

解放前，从南到北，地主、富农和商人常以极低的价格向果农預购果品。在广东有叫“买柑花”、“买柑叶”的，在东北有叫“典花”、“典枝”的。例如，在广东潮安地区果农多种柑桔，当柑花初开时，几个月后果子才能成熟，而果农逼于生活就把柑桔預售給地主、富农和商人，这叫做买柑花。当柑树新种还在长叶时，地主、富农和商人就用借貸形式預购果农二、三年后的柑桔，这叫做买柑叶。无论是买柑花或者买柑叶，地主、富农和商人对果农的剝削都是非常残酷的，他們所得的債利，往往是預购金額的几倍。

解放前，在江苏无錫、浙江平湖等地区，养蚕的农民經常受地主、富农和商人“买青桑”的剝削。在浙江吳兴一带的蚕农，解放前生活很苦，每到年底，由于无法交清租稅和債款，家中无物可以典当，只有寅吃卯粮，把明年春天的桑叶預先卖給地主、富农和商人。地主、富农和商人趁机杀价买青桑，每担的价格只有春天桑叶价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蚕农靠卖青桑渡过了寒冬，到了明春养蚕时，由于桑叶卖了，只得再向地主、富农和商人买回来。这时地主、富农和商人壟断居奇，抬高价格，蚕农要用高出卖青桑时三、四倍的价格买回桑叶。蚕农买回桑叶的錢从哪里来呢？仍然靠借高利貸。当地有一种“加一鈿”的高利貸，即借十元，二十天归还加利息一元。蚕农收了蚕茧出售后还債，經過三番五次高利貸的盘剝，卖去蚕

苗的錢已經所剩无几了。

四川省郫县出产烟叶。解放前每当新烟还未收获前，許多烟农急于用錢，把头商人“烟經紀”就杀价預收烟叶。这时离开收获期不过两个月左右，但到收获时，烟农交給“烟經紀”的烟叶，十五斤当十斤，五斤就作为烟农所付的利息。

上面所举的还仅仅是买青苗的几种形式，在苏浙一带还有叫“卖青米”、“卖空仓”的，皖北有叫“妖风稻”的，閩南有叫“卖青谷”的，湖南有叫“卖望”、“卖新谷”的，河南西部有叫“卖期花”的，广西有叫“禾花谷”的，等等。从这里可见旧社会买青苗流行之广和农民受害之深了。

地主、富农和商人在向农民买青苗时，除杀价之外，还用其他种种恶毒残忍的手段吮吸农民的血汗。

一种是預购金不付足，扣下一部分作“保金”。解放前，东北地区的“粮棧”专门做买青苗的买卖，不仅杀价，而且当农民卖青时只給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現錢，其余的扣下作为“保押金”，要等谷物交清才付給农民。在解放前物价一日数涨的情况下，等农民拿到其余部分的粮款时，这笔錢根本就別想买到什么东西了。

还有一种是用开远期支票的手段欺詐农民。这与上面的一种是一样的狠毒，远期支票到期时，货币已大大贬值，农民甚至損失得一无所有。在奉賢四团地区，有一个姓沈的貧农，一九四七年秋天在采收棉花前半个月，卖给奸商四担“抛盘花”，当时奸商假意用高于市价的价格收买，但有一条，只开支票不付現鈔。这个貧农在奸商的欺騙下，就拿了一张三十天

到期的支票。半月后四担棉花交给了奸商，再过半个月之后，这个农民到银行去兑现，拿到手的钞票只能买两盒火柴，才知道受了奸商的骗。他结果交不出地租，六亩佃田被地主收掉，无以为生，只得到地主家去当雇工，妻子靠帮零工过活。

旧社会，广大贫苦农民吃的这种苦头不知多少！“二月卖新丝，六月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望见田里谷子黄，穷苦农民饿断肠”，就是贫苦农民遭受买青苗剥削的痛苦的写照。农民在买青苗等高利贷的剥削下，如遇到灾年歉收，交不出农产品时，就更加遭受土豪劣绅的勒逼。广大贫苦农民在封建地租和买青苗等种种剥削下，最后只得出田典屋、鬻妻卖女，弄得家破人亡。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农村封建剥削制度被消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基本完成，广大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康庄大道。今天，农民的生活安定，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广大公社社员口粮都由国家和集体作了合理安排，收入有集体按劳分配，很多人在信用社都有存款，再也不用担心“春荒”时“青黄不接”了。社员如有特殊的困难，集体还会给予帮助。国家为了支持集体经济发展生产，每年还向社、队发放大量的无息贷款和粮棉预购定金。这些无息贷款和预购定金，不要公社社员负担一分一厘的利息。从这里比较一下，可见新旧社会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

# 标 会

## 一 农

讀者同志：你知道“合会”是怎么回事嗎？“合会”是解放以前我国民間流行的一种信用形式，它本身又有很多种形式，如“輪会”“搖会”“标会”等。这里只介紹其中的一种形式——“标会”，它往往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貸。

标会一般有十儿人参加，发起人称为“会头”，其他参加的人称为“会脚”。一个标会都要分成若干期，期数是和参加的人数相等的。每一期的間隔時間，有十天的，有半月的，也有一个月的和几个月的。标会到期，每一个参加者都要按规定付出相同数量的貨币，这称为“会金”。每一期会金的总数有十几元的，几十元的，也有数百元或者更多一些的。第一期的会金，由会头坐收，不付利息。会头也負有責任：如果有人收了大家的会金，而以后到期不付会金，会头就該出来交涉。从第二期起，每期由沒有收过会金的会脚进行投标，誰出的利息最多，就由誰收会金(扣除利息)。所以这种合会的形式称为标会。

在旧社会里，穷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困难，借貸无門，因此，参加标会也就成了他們获得借款的一种办法了。

标会是一种高利的竞争，因此它的利息往往高得惊人，有时甚至超过印子钱的利息。这种高利的标会和其他高利贷的区别，就在于它还披着一件互助的外衣。对穷苦人来说，它实际上是另一种陷阱而已。下面请大家看看解放前一次标会的情形：

那是一九三五年秋天的一个下午。

皮匠阿六因为妻子前天突然生了重病，为了请医生，把棉衣都“当”了，到现在买药的钱还没有着落。今天又是标会到期的日子，拿什么去付会金呢？他想：唯一的办法是标着这次会，收了会金也好给妻子去买药。他又想到：这个标会还只是第二期，参加竞争的人一定多，要用会金，就得付高利。可是现在也只好先顾眼前再说了。阿六拖着沉重的脚步朝一爿小茶馆走去。

小茶馆的老板名叫祥生，也就是这个标会的会头。当阿六走到茶馆门口时，只见参加标会的人都到齐了，祥生正和几个参加标会的人在谈话。

一个中年妇女对一个身穿长衫近五十岁的人说：“钱老板，你还会等这几个钱用？”

那个被人称为钱老板的人说：“这几天，我就象过年三十差不多，放出的账收不起来，上面南货行里欠的款子急等汇去，款子再不去，今年的年货就进不来。今天如能收个会，也多少好凑个数目。”

老于世故的祥生打着圆场说：“这就叫小有小的难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嘛！”

阿六听了里面人的对话，心上好象顿时被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在阿六进了茶馆以后，就开始标会了。标会的方法，一般是参加竞争的人把自己愿付给每人利息的数目，秘密写在纸上，最后一齐揭晓。这里因为大多数人是文盲，所以他们用的是手握筹码的办法。

一个人先把拳头往桌上一放说：“我手里有一个铜板就算二十个铜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手中铜元所代表的钱数，就是愿意付给每人利息的数目。（铜板即铜元，当时一元合三百个铜元。）

另一个人说：“我手里有一个铜板算一角。”还有几个人也这样做了。

这时那钱老板的手还放在长衫的袋里，只听见他袋里铜元相碰的叮当声。突然，他把拳头往桌上一放，用力地说：“我手中有一个铜板算两角。”听他这一说，有人竟伸了伸舌头。

阿六早已把袋中仅有的两个铜元握在手中，一直在犹豫，不知说多少好。听了钱老板的话，心里更是跳个不停。心想：我今天根本付不出会金，如果标不着，当场就要出丑。出丑还在其次，更要紧的是家中妻子的病又怎么办呢？想到这里，捏紧了两个铜元一伸手，咬了咬牙说：“我的一个铜元算两角半。”

最后揭晓了。有人出的利息是每人四十个铜元，有人是五十个铜元，也有人愿出三角钱的。阿六特别注意钱老板的手，谁知他笑了笑，把手一摊，原来是只空手。阿六出的利息是每人五角，最高，由阿六收会金。

那中年妇女半真半开玩笑地对那钱老板说：“你真是老狐狸。”那钱老板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和我虽也有困难，但总比阿六有办法一些。阿六家中有病人，这次会钱应该让他收嘛。”

祥生把其他人的会金收齐，交给了阿六。参加这个标会的共有十一人，半月一期，每人每期付会金一元，因此名义上应收会金十元（自己的除外）。标会的利息是收会金时一次付出的，只付给没有收过会金的人。因为这是第二期，所以除会头外，对其余九人都要付利息，每人五角，利息一共是四元五角。扣除利息，阿六实际只收到五元五角。而其中有一元是收回他过去付给会头的钱，所以真正借用别人的钱只有四元五角。可是在今后的四个半月里，他却要分期付出九元，这是什么利息呀！阿六细算了算账，望着这点钱，滚下了几滴眼泪。

读者同志，这就是标会。象这种标会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在头上出高利收会金的，都是象阿六那样的穷苦人，他们是受别人剥削的。象那个愿向每人付三角利息的人，也一定是个急需钱用的穷苦人。在这里他是拿进了五角利息，但以后他还是要付出高利的。虽然他所受的剥削可能没有阿六那样重，但他仍然是受到了别人的剥削。旧社会里的穷人，明知出高利用会金等于是喝盐卤解渴，但是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也只能走上这条路。阿六的遭遇，只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一个代表罢了。

那些有钱人，可以等到后面收会金，因为越到后面，要付给利息的人越少，所以他们收进的利息多，付出的利息少；特

別是最后一个收会金的人，可以收进所有人的利息，而自己則一文利息也不用付。所以他們是剝削別人的。象那个趁人之危，弄虛作假，哄抬利息的姓錢的，就是他們的代表。

前面說过，标会的利息，只付給未收会金的人，所以收会金人付出的利息总額一般是越往后越少；但从收利息人收进的利息来看，則有一种越往后越多的趋势。有时甚至会出现利息超过会金的事。这怎么可能呢？我們就根据上面介紹的这个标会的规模来作个說明吧。在这个标会的第九期，如果在这三个还没收过会金的人中，有两人因急需用錢而进行激烈的竞争，或者是一人急需用錢，而其他两人有意哄抬利息，那末急需用錢的人就会愿付每人一元一角的利息（超过每人会金一角）。因为即使这样，他付出的利息也只有二元二角，还不及阿六所付利息的一半。何况他过去已收进过不少利息，所以他可能沒有吃亏。正因为如此，对有些人來說，参加标会，既能收到互助的“美名”，又能收到丰厚的利息，比直接放高利貸好得多。真可算是“名利双收”。象姓錢的这种人，参加标会，也是他生財之一法。

最后我們来看看会头。会头决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这是很清楚的。会头的权利是第一次坐收会金，不用付利息。这当然是沾了大家的光。会头的义务是負責督促会脚到期付清会金。这实际上就是保証那些有錢人可以穩穩地收进丰厚的利息和最后收回本金。沾大家的便宜，为少数剝削者服务，这就是会头所扮演的角色。

讀者同志，現在我們都生活在幸福的新社会中。新社会

的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們职工有劳动保险;如发生困难,国家和集体有困难补助金,同志之間还有互助儲金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标会这一恶习已被逐渐消灭了。

# 祠堂

董俊明

在旧社会,反动政权和封建的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身上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祠堂,就是封建族权的一个具体体现。

封建族权能构成束缚广大劳动人民的大绳索,是通过家族组织实现的。在农村,许多村子多半是同族聚居的,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地主阶级就利用一族一姓的聚居,建立家族组织,修建祠堂,利用封建族权对农民进行统治和压榨。所以说,祠堂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和欺骗农民的一种工具。

祠堂,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分地主、农民的区别,是同宗同族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地方,但实际上祠堂是被地主阶级把持的,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场所。

祠堂里有一套严密的封建家族组织。这个组织里的主要成员有所谓宗子、宗长、宗正、宗相、宗直、宗课等等。宗子也就是族长,是祠堂的代表,是族内的最高统治者,其他如宗长、宗正等都是宗子的助手。上述祠堂组织里的主要职位都是由同族中的地主分子所把持的。族长及其爪牙对族内农民的统

治权，就是封建族权。

万恶的、狡猾的地主常常以族长和同宗同族的名义对农民进行种种欺騙，企图掩盖地主和农民之間的阶级对立、麻醉农民的斗争意识，以达到让农民听任其压榨的目的。

地主阶级欺騙农民說，“国有宗庙，家有宗祠”，祠堂是全族人共有的，并胡說什么“千金难买一个姓”、“同姓一家亲”，同宗的地主、农民“总归是一家人”，要农民不去反抗他們，安于被剝削、被压迫的地位。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同一宗族的地主和农民，也确是同一祖宗的子孙，但由于阶级分化，同一族中就出现了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天下乌鸦一般黑”，同宗同族內的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和剝削并不比异族异姓来得輕，同宗同族內地主对农民的压榨除去一般的手法外，还利用祠堂等封建族权对农民进行种种压榨。

地主阶级常常借口修祠堂、續譜、开祭，搜刮同姓貧苦农民的家产錢財。族长规定，族內农民凡是不愿出錢的，就是“大逆不道”、“目无祖宗”，就要捆进祠堂，綁上大柱，严惩示众。农民在地主的勒索下，往往被逼得傾家蕩产，妻离子散。例如，湖北省通山县洪港公社党委书记王定旺同志就曾以解放前的亲身遭遇，揭露了地主阶级借修祠堂为名进行残酷剝削的事实。有一年，地主說要修祠堂，规定修“洪公祠”总祠每个成年男子要出一元五角，修本房的分祠要出四元，續譜每人要出一元，开祭每人要出五角，每斗田又要出六角，那年王定旺家有三个成年男子，有八斗田，总共要出几十元，一律都要銀洋。一个貧

苦农民的家庭哪有这么多钱呢？他家总算有点田，无可奈何卖去了两斗田，才幸免了拷打等迫害。另外一些无田地的人家情况就更惨了。长工王义根，一家有四个成年男子，听说每人要出六、七元钱的祠堂费，实在发急。这时，恶霸地主、国民党的区长王华然说：“修祠堂是十年难逢的大喜事，钱非出不可，没有钱我可以出借，要多少有多少。不过现在借钱是三个月本利平头。譬如借六元钱，三个月到期得还十二元。”王义根听他把账这么一算，心里更急。这怎么办？不出吧，以后姓不成王，还要捆大柱，受到毒打。出吧，王华然的息钱滚得实在太厉害。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就把自己的小儿子以十五元钱的代价出卖。王义根为了出祠堂费就这样被逼得卖掉自己的儿子。在旧社会，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又何止是王义根一个人呢！仅据湖北省通山县燕厦区的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〇年四年间该区王姓的贫苦农民，为修祠、续谱、开祭而被逼卖田、卖地、卖房屋、负重债、卖儿女的就有七百多户。

地主还用收祠堂田租的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削。一般的祠堂都有几十亩的祠堂田，多的有几百亩甚至上千亩。据江苏省苏州专区东山等五个乡的调查，解放前，祠堂田就有八千多亩。这些土地除了一部分作为屋基、坟地之外，其余都出租给农民耕种。祠堂田，有些是族内捐献的土地，有些是族内绝户的土地，有些是用祠堂田租购买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了祠堂田后，全部由族长等地主掌管，地租也由他们占有。祠堂田是族长等地主借祠堂名义集中和占有的大量土地，它的

地租是封建地租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剝削比单个地主出租土地的剝削来得隱蔽，对农民具有很大的欺騙性。祠堂田的地租都是很高的，一般每亩要收六、七成之多，而且地主还勒令农民，要在收获以后规定的限期内繳租，对于緩繳租的农民，就要加成收租。如果农民繳不出租，他們就指派爪牙，甚至勾結反动政府的官員，派遣警察向族內的农民逼租。如苏南甘露鎮有一个姓徐的农民解放前租种了三亩祠堂田，因欠了六斗租，就被族长派人背去了家里的大门并搶去了其他财物。农民对这种搶劫行为十分憤怒。

在旧社会里，祠堂仿佛就是个独立王国，当族长的地主就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太上皇。祠堂里有一大套族规族法，这些族规族法都是些宣扬封建迷信和提倡封建伦理道德的东西。农民如果违反了这些，就被地主說成是“犯法”，就得被迫进祠堂挨板子。除去打板子外，还有烧香賠礼、罰酒席、上吊、滾狗刺、除譜、出逐、挖眼睛以至沉河和活埋等等。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在祠堂的繩索下含冤而死！

湖北通山县燕厦区一九二五年鬧灾荒，长工王义能一家五口人，几天见不到一粒米，餓得实在沒有办法，他就在地主王会龙的地里挖了几个紅苕。王会龙知道后，马上就找族长；地主恶霸們一商議，說王义能是“造反”，要过极刑。这些恶毒的地主，接着就把王义能提进祠堂，先打了几十大板，又挖去了两只眼睛，最后就把王义能活埋在苕洞里。

燕厦地区在解放前还有这样一个事例。貧农王有权同他的叔父地主王密泉两家同住一栋房子，共一个巷道。后来地

主王密泉霸占了巷道，王有权没法只得再开一个后门。地主王密泉就抓住这件事，向族长告发，說王有权冒犯长辈，私开后门。王有权被迫将仅有的六石谷子卖了，請了两桌赔礼酒。地主恶霸們吃了酒后还不罢休，一定要王有权到祠堂里烧三炉香，跪三天，打几十大板，才能了事。王有权看到重罰难熬，不得不偷偷地离开燕厦区，流落外地，一直到解放后才回家。

从这些惨痛的和血淋淋的事实中可以看出，貧苦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間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同姓同族的骨肉之情和甘苦与共的手足之誼，“同姓一家亲”、“千金难买一个姓”，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用来欺騙和剝削农民的弥天大谎。修祠堂和祠堂內的續譜、开祭以及祠堂田等对同姓同族的农民來說，犹如几根大吸血管，万恶的地主通过这些吸血管不断吮吸着农民的血汗。

祠堂不仅是地主阶级用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场所和残酷压迫、剝削农民的工具，也是杀害革命干部、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司令部。在旧社会里，所謂族长等主管人往往就是国民党的区长、乡长、参議員等官吏，或者是土匪军队的什么清乡团长、联保队长等。他們同国民党反动派穿的是一条裤子，干的是一个勾当。因此，祠堂也就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司令部，族长成了反共反人民的司令官。他們利用族权镇压农民，組織地主武装，杀害革命干部及其家属。

地主阶级为了达到其利用祠堂和族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目的，还特地把参加革命的农民也列为祠堂的族规、族法中严惩的对象。如前面談到过的湖北通山县燕厦区有一个地方在

一百五十戶中就有十三人因參加革命活動被地主武裝槍殺了，有四戶紅軍家屬被賣了，財產被搶光了。族長地主惡毒地說：這叫“血流匪戶，斬草除根”。就在同一地區，當一九四七年解放大軍南下時，這些地主惡霸看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快要完蛋，他們還妄圖作垂死掙扎，在祠堂里組織什麼“宗族自治會”，糾集他們的爪牙，進行種種反革命活動。

又如上海電機廠有一個工人，他家也是地主通過祠堂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受害者之一。他家原在湖北省漢陽縣合豐地區，解放前，當他六歲那年，全家老小給地主壓得透不過氣來，他的大哥便去投奔紅軍。地主李光勛知道同姓的人鬧起革命來了，就通過清鄉團把他的父親抓起來，要他的父親交出兒子。不久，他的父親就被殺害了。接着，他的二哥、三哥和他自己懷着血海深仇，也都到大哥的部隊里參加革命去了。後因三哥和他年紀太小，跟不上部隊，在回家探望時又被地主李光勛抓起來。當夜地主李光勛就把兄弟兩人帶到村西的祠堂里，說他們“違犯族規”，指揮狗腿子李傳中用矛刀從他三哥的嘴里刺到胸脯。地主殺害了三哥後繼續要殺他，但在鄉親們的怒責下，地主才被迫改變主意，說“待長大了再殺，不許族人送東西給他吃”。當時他被迫單身逃離了家鄉，常年在外流浪。

舊社會的一切，無不打着階級的烙印。地主階級所耍弄的祠堂和一套封建族權統治的手法，只要同上述許多血淋淋的事實一對比，立即真相大白，其階級實質馬上暴露無遺。

解放以後，在黨的領導下，封建地主階級已被推翻，廣大農



上海西郊虹桥乡的一个过去的祠堂，解放后农业合作化时已成为妇产院（现属上海县虹桥人民公社）。

民已摆脱了封建族权的统治，作为剥削阶级剥削和统治农民工具的祠堂，有些成为人民公社的会议室，有些成为农村俱乐部，有些成为社员子弟学校……。农村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风尚正在发扬。但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残余还存在，一些敌对阶级分子还不甘心于自己阶级的被推翻，他们在怀念过去，在寻找复辟的机会。如有的地方的地主、富农等敌对阶级分子，还企图用封建宗法思想来欺骗干部和群众，拉拢同族同姓的干部和农民修祠堂、排辈份、修族谱等，想用这种种手法模糊干部和群众的阶级界限，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阴谋实现复辟。因此我们就要提高警惕，站稳立场，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我们要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

**問題。**对于无产階級來說，它的宗和祖，不是什么张氏、李氏或者王氏，而是天下受苦受难的人，是为人民牺牲流血的革命先烈。无产階級时刻关注的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階級利益高于一切，整体利益高于一切，革命大家庭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无产階級的原則。

有形的繩索虽然已經斬断，无形的繩索还可能附着某些人的躯体。千万要警惕啊！

# 丫 头

董 俊 明

一提起“丫头”，不能不使人想起电影《白毛女》中的故事。佃农杨白劳就是在恶毒的地主黄世仁的租债勒逼下，被迫将喜儿卖给黄家做了头的。喜儿遭受的苦难，正是旧社会丫头所处境况的一个典型。

丫头也叫了环、婢女、使女，是在地主、资本家家庭中，专供主人役使的未婚的女奴。剥削阶级奴役、压迫了头，剥削了头的劳动，早在奴隶社会里就有了。以后奴隶社会虽灭亡了，但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仍从奴隶主阶级那里沿袭了这一制度。他们把丫头作为自己的“财产”，丫头没有一点人身自由。

解放以前，把自己的女儿卖身给剥削阶级当了头的，都是城乡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那时，贫苦的农民受尽了地主等剥削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终日在饥饿线上挣扎，一遇到天灾人祸，更是走投无路。地主就趁贫苦农民交不起租税，还不出债务的时候，用种种毒辣的手段，迫使贫苦农民以年幼的女儿来抵租抵债，典卖给自己做了头。

丫头除了是贫苦农民被迫出卖的女儿以外，还有一些是

地主奴仆的女儿。在剝削階級的眼里，奴仆的儿女还是奴仆，于是地主奴仆的女儿生下来以后，便必須給地主做了头。

卖了头有卖絕和活期两种。卖絕是指貧苦农民把自己的女儿出卖給地主做了头时，一次卖絕，不得贖回。活期是指貧苦农民出卖自己的女儿給地主做了头，有一定的期限，名义上规定几年或十几年期滿以后可以贖回。活期的了头，只是在出卖的期間失去人身的自由，成为奴隶。但事实上，在旧社会里，不管卖絕的了头还是活期的了头，只要是入了虎口，也就休想有出头之日。卖絕的了头不用說，活期的了头一般也是不能回来的。因为有的因家庭貧苦不堪，无力贖回；有的沒有到卖身期滿，早就被活活的折磨死了。

地主买了了头，就把了头作为私产，当牲畜一样地任意驅使，对她們进行极其残酷的剝削和压迫。

了头在主人家里担負着极为繁重的劳动，即使是十岁左右的年幼了头，也要干各种劳累的重活。如上海郊区松江县城西公社有一个女社員，在解放以前，曾被卖給地主孙可成家做了头，她当时才十二岁，但什么活都得干。清早起来就要打扫、挑水、倒马桶等，干完后还要下地干活，回来还要做其他杂务；晚上还得替抽鴉片的地主孙可成敲背、捶腿、烧鴉片，夏天更要替地主不停地打扇子，一直要做到深更半夜。她这样日夜地侍候地主，弄得劳累不堪，因此，常常在干活时体力支持不住而暈倒。有一次，一早起来倒马桶，因人小，端不动，又加上肚痛发热，头一暈，連人带马桶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头也撞破了。地主看见了，胡說什么这会带来“晦气”，拿起棍子便

打，把她打得昏了过去，当醒来时，又逼她马上去干活。地主就是这样狠毒地虐待幼小的丫头。

丫头不仅受地主任意差役，担负着十分繁重的劳务，而且她们的生活待遇连主人饲养的小猫小狗也不如。她们在地主家吃的是剩菜、残羹。每当主人吃饭的时候就必须在旁边侍候，只有在主人吃完了饭，才能吃点下脚。象安徽霍丘县李家圩有一个恶霸地主的婆娘，还狠心地把吃剩下来的面条、面汤先倒在猫食盆里，让猫吃过以后，再把猫食盆踢到了头面前，强迫了头把剩下的残羹吃掉，并逼着了头把猫食盆舔干净。丫头穿的也很惨。冬天，丫头哪里还能捞到棉衣棉鞋穿，她们光着脚，仍得替地主干活，手脚常常被冻得生疮溃烂。

丫头不仅是劳务重，生活苦，更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要遭到地主的种种迫害。丫头甚至不能在主人面前随便说话，更不准和主人顶嘴。主人不仅可以支配了头的劳动，还可以任意处置了头，可以当作礼物送人，可以当商品出卖，可以任意侮辱、糟蹋，以至可以把了头毒打致死或者活埋陪葬。例如，广西灵山县关唐村有个丫头，就是被活活地推入坟墓，给地主容广贤作陪葬的。

地主家里订有种种压迫和残害了头的“家法”，丫头对于主人的种种虐待，只能绝对顺从，不得有半点违抗，否则就要受到所谓“家法”的制裁。有的地主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套刑具，当他们认为了头违反了自己的意愿时，就用刑具加以处罚。例如，解放前，湖南省桂阳县地主刘伯龙家有个姓李的丫头，有一次，用大斗量了粮食给农民，就受到地主的毒刑拷打。

地主把她的手指捆绑在一种特制的刑具上狠狠地加以毒打。她被打得鲜血直流，手指骨也被打断了。还有个名叫彩霞的丫头，在给地主端菜打扇时，用手擦了一下汗水，地主婆就将她从中午一直打到晚上，被活活地打死。又如，解放前广西省灵山县有个在地主家做了头的十二妹，仅因打水慢了一些，就被地主婆宁陈氏毒打后，放进蒸籠活活地蒸死。上述这些苦孩子的遭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丫头中受欺凌、受迫害的几个例子罢了。

丫头在地主的残害和折磨下，有的被迫上吊或投井自杀，有的偷偷地从地主家里逃出来。可是，逃出了地主的家庭，又怎能逃出那吃人的旧社会呢？

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卖买了头的制度也随之消灭了。党和毛主席把旧社会里的受苦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放了出来，使丫头也获得了新生，旧社会里的奴隶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松江县城西公社有个女社员，解放前夫妻俩都是奴隶，她自己给地主做了头，丈夫替地主看坟山。现在，丈夫是生产队队长，自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成了生产队的好管家。又如有个在旧社会当过十四年丫头的妇女，解放后不久，就参加了工作，后来又被选为妇女代表，当上城镇的人民代表，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激动地说：“新旧一对比，这是多么巨大的变化！我们在旧社会饱尝黄连苦的人，深深地感到今天的生活象蜂蜜一样甜。但是地主阶级剥削我们劳动人民、欺压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我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我

还要教育子孙后代永世不忘！我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革命下去。”她的这些话，道出了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